

从伦理本位迈向核心家庭本位

——论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文化特征

谭同学

摘要：与“伦理本位”的乡村社会相比，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伦常”道德不再是它的基础，但其新基础也非宗族、地缘组织、基层市场结构，抑或“个人”，而是核心家庭。核心家庭本位已成为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的文化特征。

关键词：乡村社会结构；伦理本位；个人；核心家庭本位

一、传统乡村社会结构的 文化特征及其变动

（一）传统乡村社会结构的的文化特征

20世纪30~40年代，老一辈社会学与人类学家们对中国乡村社会结构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经典论述。这些论述之间虽不无出入，但仍为我们勾勒出了传统乡村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

对这种乡村社会结构，费孝通先生曾以“差序格局”的概念对其进行了结构性的概括。^①此外，费孝通还分析了男女有别、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和长老统治等一系列社会特征，而“伦常”道德秩序是这一系列特征的共同基础。^②

在分析传统乡村社会结构的的文化特征方面，除了费孝通之外，梁漱溟也是学界熟知的大家。梁漱溟认为，就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言，传统中国人（尤其是农民）“并不偏重任何一方”，而特别看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故可以称之为“伦理本位”。^③又由于看重个人间的关系（在梁漱溟的分析中，特指人伦关系），即不太看重团体，进而也就很难用普遍主义的道德准则去处理自己周围的社会关系。依照梁漱溟的分析，“伦理本位”表现在经济上，有共财之义、分财之义和通财之义的特征；表现在政治上，使得中

国“一切政治皆伦理”；表现在社会信仰上，因道德重要性的凸显而使得宗教少有发挥作用的余地。^④梁漱溟还绘制了两个模型加以比较（参见图1中的模式1与模式2），^⑤以形象地展示“伦理本位”社会的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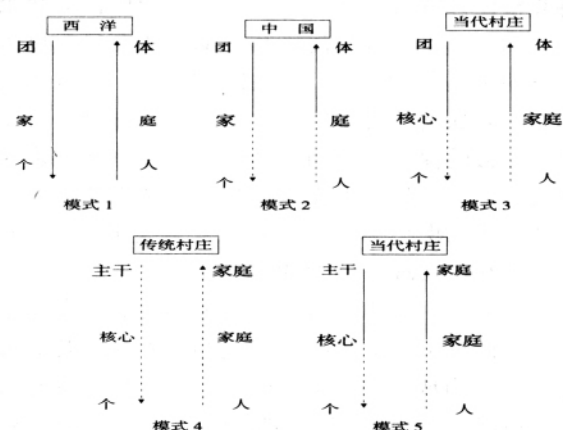


图1：个人、家庭与团体关系模式图

（图例：1. 以字体大小表示其位置之轻重；2. 以箭形线一往一复表示其直接相互关系；3. 虚线表示其关系不甚明确。）

从经验层面来说，费孝通、林耀华、许烺光、杨懋春等老一辈学者的分析都表明，在当时的乡村社会中，主干家庭较之于核心家庭在家庭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村社区自助机制建设与农民幸福感提高研究”阶段性成果（11CSH013）

作者简介：谭同学，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广东 广州，510275）。

①费孝通 《费孝通文集》第5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334页。

②费孝通 《费孝通文集》第5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334~372页。

③梁漱溟 《梁漱溟全集》第3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1页。

④梁漱溟 《梁漱溟全集》第3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3~89页。

⑤模式1与模式2为梁漱溟所归纳；模式2中的“家庭”较为侧重于指传统时期居主导地位的主干家庭。

经营、社会继替等领域具有更重要的作用。^①也即,这种文化特征在家庭内部关系上,表现出来的是主干家庭大、核心家庭次之而个人最小的模式(依照梁先生的图形法,我们可得模式4)。

(二) 乡村社会结构变动及其概念化尝试

1949年后的“革命”话语及其实践,给乡村社会结构带来了诸多影响。但这些影响究竟如何?研究者们提供了诸多回答,其中有两种观点构成了鲜明的争论。第一种观点强调社会结构变动的一面,认为“革命”主导的国家完全吞没了社会,乡村社会结构及相应的权力格局、道德秩序都发生了断裂性的改变。^②第二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社会结构有相当强的延续性,即使“革命”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它。^③

与以上两种观点不同,杨庆堃一方面认为“革命”话语及其实践带来了社会剧烈变动,^④但他同时注意到了生活实践中亲属关系仍具有很重要的作用。^⑤笔者也认为,对此我们该追问的问题应是社会结构在哪些方面发生了变化,哪些地方呈现出了延续性,而非简单地在“变”或“未变”之类非此即彼的思路中徘徊。在此思路下,笔者曾以湘东南地区桥村的田野经验为基础展开分析,认为“革命”话语及其实践的确造就了底层村民的“翻身”,^⑥村民接受了政治化的社会分层,但并没有真正接受阶级化的道德标准,村庄的横向社会结构(以“己”为中心、以“伦常”为标准往外“推”的圈层结构)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⑦

与“革命”话语及其实践一样,改革开放的浪潮也给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带来了巨大的影响。那么,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基础究竟是什么呢?针对弗里德曼的宗族理论和施坚雅的基层市场区系理论,^⑧基于广东中山小榄镇菊花会

发展历程的田野经验,萧凤霞指出,宗族、地缘和基层市场结构是共同发生作用的。^⑨可是,这三者的综合体是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基础吗?

进而,假设排除宗族、地缘及市场结构等因素的话,对于什么才是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基础这一问题的关注,就似乎只能将视野转向家庭了。在此视野下,目前形成了两种较有影响的观点。例如,刘新(又译流心)认为,个人与利益至上使得农民的生活实践从祖荫下转为在自我的阴影下,人格极其易变。^⑩此外,作者对个人生活现时性(无过去、无将来),乃至人格不确定性予以了强调。^⑪再如,当刘新强调个人在乡村社会结构中的重要性上升时,阎云翔的论述给出了一个彻底的“个人论”:“无公德的个人”是当代乡村社会结构的基础。^⑫

二、道德转型及其基层政治表现

(一) 维系自我中心的道德

如上所述,无论是费孝通先生在论及“差序格局”时,还是梁漱溟先生在概括传统乡村社会结构的文化特征时,都十分强调道德的作用。但很显然,这个道德体系在1949年后的社会急剧转型中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以“革命”道德话语主导的村庄生活,试图将村民从“封建”道德体系中解放出来,引向社会本位的道德秩序。但由于此道德秩序对集体和“尊老爱幼”的强调,事实上它很大程度上模拟了村庄原有道德秩序的核心部分,以至于单位化体制在村庄层面消除之后,后者得以重新展现出来。可以说,经国家权力主导下的“革命”道德原则改造,村民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

①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5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349页;林耀华《金翼》,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147页;许烺光《祖荫下》,台北:南天书局,2001年,第105页;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6~73页。

②Siu Helen F., *Agents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292; 张乐天《告别理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页;吴毅《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92页。

③Potter S., Potter J., *China's Peasants: the Anthropology of a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269; 韩敏:《回应革命与改革》,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59~264页; Richard Madsen, *Morality and Power in a Chinese Village*, C. 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Chapter 6~7.

④C. K. Yang, *A Chinese Village in Early Communist Transition*, Cambridge: Technology Press,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959, chapter 9~14.

⑤C. K. Yang, *The Chinese Family in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Cambridge: Technology Press,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959, p. 180.

⑥参见[美]韩丁:《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韩惊等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年。

⑦谭同学《“革命”话语竞争与乡村社会结构变动》,《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⑧参见[英]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刘晓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美]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⑨萧凤霞《传统的循环再生》,《历史人类学学刊》2003年第1期。

⑩Liu Xin, *In One's Own Shadow: An Ethnographic Account of Post-reform Rural China*, C. A.: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p. 184~185.

⑪[美]流心《自我的他性》,常姝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44~145页。

⑫[美]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龚小夏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243页。

自主性（如婚姻自主观念深入人心），但在核心道德原则上并没有走出“伦常”道德秩序，更没有进入到以集体为本位的道德状态。

与“革命”道德话语不同，在20世纪80年代村庄“去单位化”以后，以反思集体生活压抑村民自主性为主导的新型道德话语，倾向于将村庄道德秩序引向自主性更高且更为理性化，符合现代法治权利、义务观的方向。村民不仅获得了经营自主权及以此为基础的一切家庭事务决策权，而且得以更为自主地参与公共事务。可是，正如不少研究者已经看到的，走出祖荫的个人并没有获得真正独立自主的个性。^①相反，摆脱了传统伦理束缚的个人，往往表现出一种极端功利化的自我中心取向，其与他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出现了严重不对等。当然，国家权力主导的宣传渠道，并没有放弃以“革命”道德原则为核心的集体主义道德教育，但是，基层公共权力合法性下降和经济生活的高度市场化，使得集体主义道德教育的绩效不容乐观。

在村庄纵向社会结构方面，村民能否实现社会流动，已日益变得与道德没有直接关系。在村庄公共事务参与方面，道德失去了吸引力，侵犯公共利益的行为开始泛滥。在家庭里面，夫妻关系日益平等，但在不同代际的权力关系中，明显偏向了年轻的一代，部分老年人的赡养已经成为问题，遑论孝道。在家庭外面，理性算计成为了一种主导的道德原则，村民与他人关系的建立、维系都循此原则而进行。

与“伦常”道德秩序相比，从公私两个方面看，村庄道德秩序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在这里，村民也讲关系，但此关系却已非彼关系，此关系主要是对于自我利益是否有用的工具性关系，而不再是梁漱溟意义上的人伦关系。道德，如费孝通所描述那般，仍是用来维系私人关系的，但其内在的意涵却出现了实质性的改变。费孝通所描述的道德主要指人伦关系，而今之私人关系则主要是围绕自我而形成的利益关系。

（二）精英政治

从近代开始，村庄外在的宏观政治即迫不得已地走向了积极行政的轨道，“无为而治”的历史已经一去不返。只不过，由于此时期国家权力下沉不甚成功，所以村庄权力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作为村庄生活一个重要方面的村庄政治也被纳入整个动员体制。除了积极行政之外，在“革命”话语

下，村庄政治的另一个重要变化即是长老统治的格局被消除，“翻身”后的中青年开始主导村庄政治。又由于“革命”道德话语和村庄原有道德秩序交错、重叠，“又红又专”成了村民介入村庄政治核心舞台的条件，担任干部及其后的行为都离不开道德话语的支持。

在20世纪80年代村庄“去单位化”以后，村干部积极行政的体制性压力仍未消除。经过一段时期的过渡后，尽管村庄的干部队伍并未发生太大变动，村庄政治的运作逻辑却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乡村干部为了完成基本的治理任务，不得不开始在制度外依靠非正式网络，保证让有能力完成任务者进入村干部的队伍。并且，在村庄政治日常运作中，村干部在不引发群体性事件和村民上访的情况下获取非制度利益的行为，往往被乡干部所默许（更何况基层政府自身也有追求制度外自主性利益的需求）。

再者，因为村庄道德秩序的变化，一般村民不仅没机会进入村庄政治前台，甚至也无法用道德化要求制约村干部的行为。村庄政治成了一个道德无以嵌入的精英场域。虽然也会有一些村民跟干部唱“对台戏”，但其基本目的并非要用民主的方式去矫正干部的不良行为，以保护村庄公共利益，而往往是考虑私利。在此类村庄政治中，村庄基于地缘乃至基于宗族认同的社区记忆也有可能被激活，但往往只是积极分子用以冲击竞争者的手段，而不是用以维系伦理关系及其“伦常”道德秩序的群体自觉。村庄政治成了一个精英竞争的场域。一般村民即使以群体的形式参与到了其中，也往往是派性竞争。这是村庄政治服从于精英竞争逻辑，非团体生活的表现。

在现代主义者看来，政治从血缘关系中分离出来，本属传统“社区”转化成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②，因此也是现代社会发展之所需。但在国家常规能力不足和社会基础张力的作用下，村庄政治与伦理关系和“伦常”道德相剥离，并未导致理性民主政治的出现，而是导致了“精英政治”。

三、道德转型及其财产观、人生观

（一）财产契约化

上文已提及，根据梁漱溟先生的论述，在“伦理本位”的社会中，社会个体在家庭中共有财之义、分财之义，在亲戚朋友邻里之间有通财

^①Liu Xin, *In One's Own Shadow: An Ethnographic Account of Post-reform Rural China*, C. A.: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p. 182~183; [美] 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龚小夏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207页。

^②[德] 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78~79页。

之义，甚至施财也是一种义务。而其所依据的原则是以伦理关系之亲疏厚薄为准。^①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在村民与核心家庭之外人员关系当中，其财产权的伦理色彩已经几近于无。在维系自我中心的道德影响下，村民各自管各家的事成道德秩序认可的常态行为。在道德秩序变化后，依据维系伦理关系的道德而形成的义务便逐步消失。在村民的礼物来往中，伦理关系上的亲疏还有所表现。在互助中，较小额的财产让度仍存在（额度小得几乎仅具象征意义），但数额稍微大一些则一般不可能无偿让度，甚至于村民向亲戚借钱也不再顺利。在亲戚圈子内部进行有偿借贷，这一原本被认为于情谊很不协调的现象，在当今乡村社会不仅已非鲜见，而且被认为理所当然。

财产权的理性化属社会现代性转型的一部分，^②从家庭外村民间的关系来看，村民不仅有了强烈的维护私人财产权的意识，而且获得了村庄道德秩序的认可。财产权不仅在法定框架中，而且在实践中已经大体上实现了契约化。无人照看而只有人觊觎的财产权，便是集体财产权和父母的财产权，对这两种财产，以自我利益算计为中心的村民，更倾向于多得之而少尽甚或不尽义务。基于“伦常”道德秩序的权利、义务观被消解后，与法治相匹配的契约意识尚未建立起来。乡土社会的边界被打破后，村民从陌生社会经验中选择性地学会了维护权利（包括财产权），却置义务于不顾，以至出现诚信不足和孝道相对式微的局面。

（二）向外用力的人生

在传统乡村社会，以“伦常”道德秩序为基础的“礼治秩序”，重在“礼”和教化，在人格上个人服从于家庭和国家，^③甚至出现即便委曲求全也要做到表面无违家长的“名实分离”的局面。^④从人生发展来看，“伦理本位”形成了“向里用力的人生”，如反省、自责、克己、让人和学吃亏，后者所得教训，如勤俭、刻苦、自励与进取。^⑤

在“革命”道德话语下，集体为重、家庭次之、个人为轻的人生观，是为村庄权力格局和道德秩序所提倡的，贫困的村庄经济也容不得过分的自私自利和挥霍。不难发现，该时期村民之人生仍以向里用力为理想。反省、自责、克己、

让人、学吃亏、勤俭、刻苦、自励与进取，都是村民对人生之要求，也是教育子女的主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一方面由于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另一方面出于对“革命”道德秩序的反思，传统的克己与勤俭等少数具体行为原则已不为年轻人所看重，但乡村社会主导的人生原则仍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根本性的变化开始发生。究其原因，从总体上说，一方面，由于代际更迭，年轻人在此时已开始主导村庄生活；另一方面，村庄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变化，权力格局和道德秩序也随之变化，影响到了绝大多数村民的人生观。在自我中心取向下，村民间甚或已经不再是马克思所说的“马铃薯关系”，而是“刺猬关系”，在与自我利益无涉的远距离时，万事高高挂起，而一旦有利益关系（甚至还不是利益冲突关系），便大有为多争取些利益而要刺对方之势。简要言之，可以说，在当下乡村社会中居主导地位的乃是向外用力的人生。多数村民主导的选择是，尽可能利用他人力量而非靠自力来满足自己的人生。

在对待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时，反省、自责、克己、让人与学吃亏已被视作“没用”的“老实人”的做法。在自我中心取向面前，忍让成为了竞争不力的表现，反省、自责与克己也变得不必要。相反，村民常责怪他人与己争利或未尽必要的义务，甚至佛教信仰者也常怪其他村民“欠”自己太多。缺乏反省与自责，常自以为是，以为他人错，成了普遍的现象。即使在最应该相互体恤的家庭内部，在与父母的关系当中，年轻村民也少有反省、自责和克己。

四、当代乡村的核心家庭本位特征

以上经验表明，较之于“伦理本位”的乡村社会而言，宗族、地缘因素在当代乡村社会结构中的作用正下降，市场结构的作用虽然变得重要了很多，但并未成为整个乡村社会结构的基础。

同样，“个人论”也值得怀疑。例如，当代乡村社会结构中的个人，似乎对核心家庭仍存有依赖，甚至有心甘情愿为之奉献的一面。由此，刘新所强调的现时性（无视过去、不管将来）

①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3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6~97页。

②[德]韦伯《韦伯作品集2：经济与历史支配的类型》，康乐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62~163页。

③李亦园《李亦园自选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41~254页。

④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5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378页。

⑤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3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77~181页。

和性格易变的个人^①只是个体在乡村社会结构中一个侧面的表现。如阎云翔所说,年轻夫妇一代,在主干家庭中对财产的要求往往变得过分,乃至虐待老年人的现象也确非鲜见^②但这只能证明,村民的核心家庭观念比主干家庭更强,且主干家庭中的关系偏向于由年轻夫妇组成的核心家庭,而无法证明“个人”比核心家庭在乡村社会结构中更重要。

倒是当我们尝试将这些经验与梁漱溟先生的论述作对照时发现,对于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结构而言,核心家庭具有文化特征上的意义。

首先,从家庭与团体的关系来看,团体对于村民的生活而言仍不甚重要。在村庄政治领域,在民主化的村民自治制度框架下,村民以核心家庭为单位的利益考虑往往强于村庄利益考虑。以至于,村庄政治成为精英竞争的场域,而并没有真正做到制度意义上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团体性生活更加难以形成,村庄公共生活衰落,公共设施和集体财产遭侵占已屡见不鲜。

其次,从家庭与个人的关系来看,核心家庭内的个人自主性有一定程度的表现,但家庭仍比个人重要。在核心家庭以外,代际关系已被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所主导。在传统乡村社会,虽然事实上的大家庭并不多,但大家庭理想仍是其重要特征,主干家庭占有主导地位。若将其模型化,则为“主干家庭大、核心家庭次之、个人小”之模式(见前图1中的模式4)。在当代村庄,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关系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在家庭的成立方面,婚姻当事人已经掌握自主权,当事人家庭内其他成员(包括父母)的意见仅仅具有参考作用。在代际更替方面,老年人明显因人为原因而非客观物质条件限制而处于弱势。若从核心家庭内部来看,个人的独立性虽已在某些方面表现出来,但个人仍围绕家庭而活动。只是在核心家庭之外的代际关系中,自我中心取向的个人(尤其是年轻人)已凌驾于主干家庭之上。与伦理本位社会不同,“核心家庭大、个人次之、主干家庭小”的格局,已经成为当下村庄社会结构中家庭与个人关

系的特征(见前图1中的模式5)。

再次,从个人与团体的关系来看,团体显得尤为不重要,乃至为个人所掩盖。就个人与团体的关系来看,个人被从家庭及相关的“伦常”道德秩序中解放出来后,并没有真正融入到一种团体生活当中。村民对公共资源所持态度不是正当利用,而是试图将其化为私利。在业缘团体中,在个人特殊化利益要求面前,章程往往不起作用,甚至难以保证诚信。不难看出,依当下主导的认同标准,家庭(尤其是核心家庭)比团体重要,个人更比团体重要,但在核心家庭内部,家庭仍比个人重要。如此,若将其模型化,可得一模式:核心家庭最大,个人次之,而团体最小(如前图1中的模式3)。与伦理本位社会相比(前图1中的模式2与模式3相比较),个人从主干家庭中解放出来后,彰显的是核心家庭(如前图1中模式3),而不是个人与团体共同变大。

让我们再回到梁漱溟先生关于“伦理本位”的论述:

在社会与个人相互关系上,把重点放在个人者,是谓个人本位;同在此关系上,把重点放在社会者,是谓社会本位。……(伦理本位)不把重点固定放在任何一方,而从乎其关系,彼此相交换;其重点实在放在关系上了。^③

在当前的乡村社会中,在社会与个人的相互关系上,村民既没有把重点放在个人上,也没有放在社会、团体上,更没有放在伦理关系上,而是放在了核心家庭上。循梁漱溟先生之分析路数,此种社会结构特征实可称之为“核心家庭本位”。

(本文部分观点曾于2011年3月31日在美国亚洲学会、亚洲学者国际协会联合举办的“亚洲研究70周年”年会上得以讨论,感谢Hans Steinmüller、赖立里、王丹、Mikkel Bunkenborg等学者所给予的帮助。本文文责自负。)

(责任编辑 洪颖)

①Liu Xin, *In One's Own Shadow: An Ethnographic Account of Post-reform Rural China*, C. A.: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p. 182~183.

②[美] 阎云翔 《私人生活的变革》, 龚小夏译,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6年, 第207页。

③梁漱溟 《梁漱溟全集》第3卷,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6年, 第95页。